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译介及索隐派的汉学研究

王佳娣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语系,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易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经书,引起了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关注,相应的译介著作相继出现。其中以法国传教士为主的索隐派以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为基础,提出儒学与天主教同源的观点,缓解了因“礼仪之争”而引起的清统治者与罗马教廷的紧张关系,并推动了欧洲汉学的发展。

关键词:《易经》;索隐派;礼仪之争;欧洲汉学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831X(2010)01-0111-02

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通过对中西方著作典籍的译介和研究,形成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并举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易经》是“五经”中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注意的中国古代典籍。其研究始于明万历时期的利玛窦,到康熙年间,对它的翻译和研究达到高峰,并持续了一百多年,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译介情况进行考察,并探讨其对传教士中索隐派思想产生的影响。

一、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译介和研究概述

《易经》本属儒家经典之一,欧阳修曾说“孔子生于周末,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古筮用也,乃作象象,发明卦义……所以推原本主,而矫世失。然后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于六经矣。”这说明从孔子起《易》就是儒家的基本文献。正由于《易》为六经之首,其意义重大。^[1]

西方传教士中最早对《易经》有所研究的当属于利玛窦。他在《天主实义》中曾提到有关《易经》的内容:“《易》曰:‘帝出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而且,在邹元标写给他的信中(《答西国利玛窦书》)也提到:“门下取《易经》读之,乾即曰‘统天’,敝帮人未始这不知天。”^[2]

根据张西平教授的研究,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是曾德昭(Alvaro de Smedo, 1586-1658)。^[3]曾德昭在《中华大帝国史》(1641年在马德里以葡萄牙文出版)中介绍儒家思想和其经典著作时,讲到了《易经》。他提到《易经》是一部论

述自然哲学的著作,通过一些自然原则来预测未来,测算旦夕祸福。中国早期的圣人们正是通过《易经》中的“奇数和偶数……拼合文字和书写符号”来发展道德和思辨的科学,同时他认为这部书又是“道德和政治的融合”。^[4]

第一位在易学西传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卫匡国(Martin Martini 1614-1661)。他在《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中提出《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并且依据中国上古史的年表和事实,提出《易经》是“中国第一部科学数学著作”。^[5]卫匡国第一次向西方指出了伏羲是《易经》最早的作者。他还初步介绍了《周易》的基本内容。他向西方读者介绍说“阴”代表着隐蔽和不完全,“阳”代表着公开和完全,“阴”和“阳”两种符号相结合构成了八个“三重的符号”(trigrams),这八个由“阴”和“阳”构成的“三重符号”分别代平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个符号反复相变又产生六十四种“六线形”(hexagram),它们分别象征和预示着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变化与发展。在该书中,卫匡国首次向西方公布了六十四卦图和介绍了“阴”“阳”的概念。

对《易经》研究最为深入的是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和他的索隐派(Figurism)。白晋是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到北京后和张诚(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一起在宫中为康熙皇帝服务,深得康熙宠爱。白晋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1697年返回法国,在巴黎作了一次演讲,其中提到:“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完美。”他还认为《易经》这本书“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

收稿日期:2008-11-28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08年科研课题《阴阳文化内涵及其英译研究》(08C013)

作者简介:王佳娣(1982-),女,吉林松原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

的哲学原理。”白晋对《易经》的研究与康熙皇帝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为白晋等人研究《易经》提供一切方便，还不时给予指示，如：“白晋释《易经》，必将诸书俱看，方可以考验；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出己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亦对白晋说，必将古书细心校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即不看。所释之书，何时能完，必将完了才是。”⁶⁰

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的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所以他的研究着重于在《易经》中寻找基督教教义，以证明儒教与天主教的一致性。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的白晋关于《易经》的书目达十四本之多。白晋对《易经》的译介，引起了莱布尼茨的很大兴趣，他与白晋通信达六年之久，并发现了《易经》中的阴阳变化原理与其发明的二进制的相同之处。

受白晋的影响，索隐派的成员对《易经》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法国传教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quet, 1665-1741)、刘应(Laude de Vis Delou 1656-1737)、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 1663-1738)等先后对《易经》进行了翻译和研究。

《易经》虽然受到了许多索隐派传教士的重视，但其出版状况却不容乐观。主要是因为在其他西方传教士眼中，《易经》充满了迷信，与科学精神相悖，没有研究的价值。同时，由于受“礼仪之争”的影响，利玛窦的“适应策略”受到质疑，索隐派的“儒学与天主教的一致性”的观点不能被其他传教士接受，造成了很多关于《易经》的译介和研究的著作不能出版的状况。

二、索隐派的汉学研究

“索隐派”是在华耶稣会士中以白晋为首的一个小学术团体，他们秉持的索隐主义是对中国古书的一种解释体系。至少到18世纪中叶，一般基督徒都相信全世界人类皆是诺亚一家在大洪水之后繁衍的子孙，惟有《旧约》中保存了对洪水之前世界的部分记忆。索隐派则认为，中国古代典籍中也保存着对大洪水前族长时代的记忆，并试图将中国古代人物同《旧约》人物对应，将典籍中某些记载看作《旧约》中的寓言。索隐派的目的是使中国人主动皈依基督教，他们相信，一旦中国人知道他们视为神圣的经典原是《旧约》的隐喻式表现，经典中包含着基督教教义，那么他们信奉基督教就不再有违背中国古训的顾虑。索隐派宣称，中国人丢失了理解古书的钥匙，他们则要为中国人找回那把钥匙。

(一)《易经》为索隐派理论体系的主要文本依据。

索隐派的重要人物白晋根据对《易经》的研究，形成三个基本的索隐主义命题：1. 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中国人信奉的哲学中没有违背基督教律令的内容；2. “太极”即上帝，为万物之源；3. 《易经》是中国人最上乘的道德与自然哲学的浓缩。这三个命题成为其他索隐派研习中国文献的共同基础。⁶¹白晋指出，伏羲是将人类最原始宗教传于中国的先知。他认为“……世界上没有比研究那包含真理而又如此难解的《易经》更能显示中国人的心神是如何契合于基督教义的了”。白晋试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的方式来证明《易经》为以色列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圣典。他说：“《易经》数

字的神秘，似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埃及犹太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此秘密是由第一个祖先传给其后代，虽然后来消失了，但必然是来自造物主之神秘启示。”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尽管索隐派各个代表人物之间的观点都不尽相同，但《易经》始终是他们进行汉学研究的主要文本依据。

(二)《易经》与汉字研究

索隐派耶稣会士专注于研究五经，尤其是《易经》，他们对这些古代文本中的神秘含义的阐释，与对汉字的分析释读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汉字被作为最重要的证据说明中国文化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伏羲既是《易经》的作者又是汉字的发明者，他被认同为以诺，通过神奇的卦象和象形文字隐藏了基督教的真理，或者说体现了纯正的逻辑。因此研究《易经》和汉字意义重大，白晋希望以此重建上帝传达给古人的智慧，并最终发现宇宙的终极真理。

索隐派对汉字的释读初看起来颇为随意和武断，但他们确实有一些阐释规则。一些简单的字形和笔画被赋予特定的神学含义：“一”指上帝，“一、二、三”指三位一体，“人”表示耶稣基督，“十”表示十字架，“口”指宇宙，“上”指天堂、天等。

索隐派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在著作《易经·大传》中阐述了《易经》与汉字的关系。其中讲到始祖从上帝那里得知元圣(基督)救赎世人的道理，将之作为“家训”代代相传，后“恐口传有失，故造书契以指之焉，画八卦以象之焉，系辞以断其吉凶”。他又引刘凝的话：指事如奇偶，象形如八卦，形声、会意如六十四卦，转注、假借如卦上加卦……天道在其中，地道在其中，人道在其中，天地的变化与创世，古帝先王的统治，哲人的传道，所有这些的根本都在这里。因此《易经》——其卦象、线条、词句和汉字都是神秘的符号。⁶²

(三)索隐派的汉学研究与“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指的是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在华传教士内部及传教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展开的有关中国传统祭祀礼仪性质的讨论。康熙安排白晋等研究《易经》的时间，正是“礼仪之争”激烈之时，此时也是康熙和罗马教廷关系紧张之时。而索隐派的产生本身是“礼仪之争”的产物，白晋等人不同意反对利玛窦路线的观点，因为若要在华生存下去只能遵循中国人祭祖、祭孔这一习俗，尊重中国文化，但这同时又不能违背基督教的教义。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白晋采取了西方神学史上早有的索隐派的做法，从中国文化本身寻求与基督教的共同点，将中国文化说成是基督教文化的派生物，这样就可化解这一矛盾。一方面承认中国文化的合理性，从而使自己能在中国立足，被清政府统治者接受；另一方面，通过索隐考据的方法，将中国文化归之于基督教文化，从而弥合了自身理论上的冲突，也能取得教廷的支持和欧洲社会对在中国传教的支持。

索隐主义被某些索隐派认为是解决礼仪之争的良方，

(下转第138页)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CAO Gang, CAI Yi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Abstract: In the concep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like the conforming to nature, the harmony of Man and Heaven, the respect to the virtue, courtesy, neutrality and peace, the honor to the credibility, the insistence to the promises, the appreciation to the personal loyalty and neglect of the individual material benefits, the intimacy of the body and the soul, the support of the outside and the inside, hides the harmonious implication about individual and natur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dividual and others or even individual and himself. If we explore deeply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he harmonious implication and 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it will positive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s a result, it will also actively strengthen the moral basis, lead the society to form the harmonious physical and mental conception on fit-keeping and raise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Key words: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ethic; harmonious society; the harmony of Man and Heaven

[责任编辑:胡伟]

(上接第 112 页)

比如傅圣泽认为,中国礼仪之所以被谴责,实因罗马谴责的是一个被错误理解和解释的经典体系,换言之,实际执行的礼仪同经典中的真正系统相对立;如果罗马接受了索隐主义解释体系,就会正确认识中国经典,就不会谴责礼仪。^[4]索隐主义的思想使得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并获得中国统治者的认可,对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4]张西平.《易经》在西方早期的传播[J].中国文化研究,1998,(4):123.

[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34.

[3]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149.

[5]孟德卫.神奇的土地:耶稣会士的适应性和早期汉学的起源[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128.

[6]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47.

[7][9]张国刚,吴荪荦.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3,(4):201-199.

[8]张国刚.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78.

Translation and Study on *I Ching*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Research on Sinology of Figurism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WANG Jia-d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Abstract: As the oldest classical Chinese book, *I Ching*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of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many translations and introductions about it appeared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n *I Ching*, the Figurist, mainly French missionaries, put forward that "Confucianism has the same source with Catholicism", which relieve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governor of Qing dynasty and Roman Catholicism and push forward the research of Sinology in western countries.

Key words: *I Ching*; Figurism;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Sinology in the Europe

[责任编辑:葛春蕾]

作者: [王佳娣](#), [WANG Jia-di](#)
作者单位: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语系, 湖南, 长沙, 410205](#)
刊名: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
年, 卷(期): 2010, 10(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7条)

1. [张西平](#) [《易经》在西方早期的传播](#)[期刊论文]-[中国文化研究](#) 1998(4)
2. [朱谦之](#)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 1983
3.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1995
4. [孟德卫](#) [神奇的土地: 耶稣会士的适应性和早期汉学的起源](#) 1994
5. [马祖毅](#), [任荣珍](#) [汉籍外译史](#) 2003
6. [张国刚](#), [吴莉苇](#) [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期刊论文]-[中国社会科学](#) 2003(4)
7. [张国刚](#) [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 200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ndysfxb20100103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7a663dd0-680c-47ce-bb1a-9e4d007833c5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